

清初古文三家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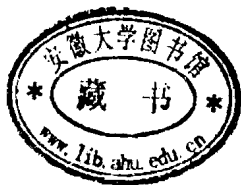
李婵娟◎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由冼为坚学术研究基金资助

清初古文三家年谱

李婵娟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古文三家年谱 / 李婵娟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1

ISBN 978-7-5100-4130-3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侯方域(1618~1654)---年谱 ②魏禧(1624~1680) 年谱 ③汪琬(1624~1691) 年谱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8989 号

书 名 清初古文三家年谱

责任编辑 孔令钢 肖爽爽 王 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编辑邮箱 sjxscb@163.com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130-3/K·013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节 概 述	001
第二节 侯方域生平交游及思想探微	003
第三节 魏禧生平交游及思想探微	010
第四节 汪琬生平交游及思想探微	016
第五节 清初古文三家的文学创作与清初文坛格局	021
凡 例	028
侯方域传略	030
魏禧传略	038
汪琬传略	046
清初古文三家合谱	053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56

前言

第一节 概述

清初古文三家,又称“国朝三家”,即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位明清之际的散文家,因其古文被宋荦合编为《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清代文人对清初古文三家的评价甚高。宋荦曾说:“三君际其时,尤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间,卓然而以古文鸣其家。”四库馆臣曰:“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祜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官方最权威的书目提要,这一评价无疑巩固了清初古文三家的地位。

关于清初古文三家的年谱,前人已分别做过相关编撰。目前所见到的年谱,多系清代后期与民国时所编撰。其中内容最为详尽的是温聚民所编的《魏叔子年谱》(1936年出版),全文约7.3万字。该谱据魏氏兄弟诗文集及相关人物文集资料辑成,记录谱主生平、家事较详,也大量征引了谱主和相关友人的诗文及论述,惜其对谱主的交游情况考证不够。其次是汪琬年谱,有其子汪筠编的《钝翁年谱》、赵经达编的《汪尧峰先生年谱》(民国间刻本)、清人顾希喆编的《汪尧峰先生行状》和清人汪敬源编的《续修文清公年谱》。汪筠谱甚为简略,全谱以干支纪年,仅简略记录了谱主的重要仕历、家事。赵经达谱较汪筠谱充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谱主的交游、诗文撰述等情况。汪敬源所编年谱最为详备,谱前录有《文清公本传》、《先正事略》、《墓志铭》、《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五百名贤祠像传赞》等资料。是谱叙录谱主家事、仕职、交游等,征引的学术、诗文著作也甚详,惜其事迹遗漏较多。关于侯方域年谱,其裔孙侯洵编有《壮悔堂年谱》一卷,记事简略,事迹遗载甚多。该谱仅是谱主生平大事的粗略记载,对其交游及著述涉及甚少。

新时期对清初古文三家年谱的重新考订编撰甚少,目前所见到的只有谢桂荣、吴玲编撰的《侯方域年谱》,附于王树林撰《侯方域集校笺》一书。该年谱对侯方域家世、生平、交游考证稍详,对部分诗文也作了系年。虽然从总体看,该年谱仍然较为简略,但这种不断挖掘历史真相、追求学术完美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这期间,

还有一些相关的史实考证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如廖玉蕙《论侯方域其人其文》、王树林《侯方域民族气节重议》、扈耕田《侯方域事迹考辨》等论文,考证也甚为精当。

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清初古文三家年谱的内容稍嫌简略单一,很少涉及三家的思想主张,也缺乏一定的历史观照。相对于清初古文三家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影响来说,前人编写的年谱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对其乃至清初文学研究的需要,重新编写三大家年谱,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清初古文三家都生活在明末清初这同一时代,其年代极为相近。魏禧和汪琬同岁,二者卒年前后相隔仅十年。侯方域长魏、汪六岁,且卒于魏、汪二人之前。另外,清初古文三家这一组合比较特殊,与一般的文学流派或文学团体不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魏禧是江西宁都人,汪琬是江苏长洲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很不一样:侯方域出生于明代官宦之家,与之结交者,多是年轻气盛、骋才纵情的前朝“遗少”,如与其并称为“明末四公子”的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等;魏禧是宁都望族,其兄弟三人在当地颇受众人敬重,与之交游者,多是忠烈隐逸之士,如与其并称为“易堂九子”的李腾蛟、邱维屏、林时益等;汪琬出生于明末书香之家,后仕于清朝,为官清廉,虽最终归隐,但与其过从甚密的,多是仕清的官吏,如王士禛、陈敬廷、刘体仁等。可以说,清初古文三家代表了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三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此外,三家的创作风格也各有特色,其作品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三种文风。邵长蘅曾说:“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四库全书总目》也评论三人:“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年谱及其作法》中曾提到:“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种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节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清初古文三家同在一个时代,同样致力于古文的创作,虽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其文章风格和创作思想也不同,但将三家熔于一炉,合为一编,不仅可以减少篇幅,还有利于编者客观公正地叙述,避免个人的偏好。清初古文三家这一研究对象身份特殊,将他们三人合做一部年谱,在三大家的相互对照中,读者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一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文学群体的思想特点与创作风气。此外,三家的交游非常广泛,年谱将对清初古文三家的师承、交游等作比较详实的考述,师友中对三大家思想性格、文学观点有所影响的来往书札及议论,也将详加征引、说明(长篇诗文则择要录入,不作全引)。且年谱将以出生或去世年份为准,列出与三大家交游可考者的生平简况(与三大家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稍详),充分展现三大家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及时代思潮,这也能为研究其友人的生平思想提供一定的资料借鉴。

章培恒先生曾在《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序》中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既需要宏观的探讨,也必须有微观的研究;而在我看来,年谱正是进行微观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笔者期望《清初古文三家年谱》这样资料性的基础研究,能够对准确认识、评价处于明末清初政治变革与思潮变异中的古文三家提供一定的帮助,更希望年谱的撰写能为探寻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社会风貌和文学思潮提供一定的借鉴资料,为推动清代文学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尽一份微薄之力。

第二节 侯方域生平交游及思想探微

侯方域位居清初古文三家之首,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性格豪迈不羁,文章、气节均名震一时。《商丘县志》云:“文之恢奇雄健,中州数百年以来,一人而已。”^①研究侯方域的生平交游及其人格精神之形成,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其文学创作。

一、侯方域的家学师承及早期性格之形成

侯方域出生于明末仕宦之家,可谓“家世清流,门阀显贵”^②。祖父侯执蒲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太常寺卿,颇有惠政。父侯恂中万历四十四(1616)年进士,曾任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又提拔过明末大将左良玉、史可法等人,是明末政坛颇有影响的人物。叔父侯恪中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亦可谓权倾一时。三叔侯忬亦以太常荫胄入南雍,才名籍甚。

富贵显赫的家世使侯方域早年即显示出恃才傲物、率性疏狂的个性锋芒,同时也造就了他慷慨大方、任侠豪爽的风范。他“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肝肺,誉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吝千金。”^③“人有一善,即在孤寒,未尝不奖激推引,与之均礼。其尤贤者,则屈己下之,唯恐不得所欲,宁易为人所可及。”^④侠义大度的性格使侯方域遍结海内诸贤。明崇祯十二年(1639)应试南京之际,侯方域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襄、张自烈、李雯、吴应箕、夏允彝等复社、几社名士结交,“一时文章、气节、经济之誉争归朝宗焉”^⑤。

侯方域自幼随父生活于官所和军营,对于纷繁复杂的政事战乱感受深切,拥有洞悉时势、辨别贤佞的眼光和才能。侯方域十七岁时即代父起草《屯田奏议》,“言之剴切似宣公,文之峭洁似家令”^⑥,充分显示了雄才大略。其后他在南京应试时

① 《商丘县志》卷九《文苑·侯方域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② 《商丘县志》卷九《文苑·侯方域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③ 邵长衡:《青门剩稿》卷六《侯方域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集部第24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④ 田兰芳:《侯朝宗先生传》,《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181册,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481页。

⑤ 贾开宗:《侯方域本传》,《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

⑥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议》后附,《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所作的论策文及其他论用人得失、论寇边、论吏治、论百姓等文章，“晓畅精详，皆素所谙练，与耳食者异”^①。面对内忧外患，侯方域深切盼望能荡尽风烟、澄清天下。少时随父军中，侯方域就多次向父献言献策，论事立议无不深中肯綮。侯方域为逃离阉党缉捕躲入史可法军中，曾随高杰军北征，亲历抗清战场，图有所为。可惜乱世之中尚未大展其才，侯方域竟抑郁而歿。

明末政坛上，宦官与大臣、言官与阁臣、在野与在朝，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林党与阉党的纷争。侯家历代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侯方域祖父执蒲、父恂、叔恪均为东林党人，他们清刚方正，因与阉党交锋而相继遭到罢黜。明天启初，侯执蒲任太常卿，因上书弹劾魏忠贤而遭到阉党忌恨，最终罢归。天启元年（1621），侯恂因上疏追论移官事及“红丸案”；又上疏论救大司寇王纪，阉党群邪为之侧目，最终也于天启四年（1624）削籍回里。侯恪在修《神宗实录》及《光宗实录》时，对魏忠贤所作恶事，据实直书，其时魏党擅权，人或危之，恪曰：“史职惟有直书耳，顾南、董何人哉！”^②父辈们不畏权奸的耿直品格对侯方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魏党倒行逆施、党同伐异的丑恶行径更令他深恶痛绝。因而应试南京时，侯方域很自然地与复社诸子同仇敌忾，痛斥魏阉，还与陈贞慧、吴应箕发起一场“数十百人，鸣鼓而攻”的声势浩大的驱阮运动。当然，此事也为侯方域坎坷的一生埋下祸根。阮大铖自此对侯方域衔恨入骨，明崇祯十六年（1643），阮大铖诬陷侯方域招左良玉军为内应；其得势后，又大肆搜捕侯方域，多次欲置之死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侯方域均辗转飘泊，与阉党权奸进行殊死周旋。

显赫的家世对侯方域性格气质及政治人格的形成影响甚大，而家学师承对侯方域文化人格的形成也意义深远。侯方域自小受叔父侯恪的影响颇深。侯恪在削籍归里之际，曾勉励门生说“但愿异日诸生作好人，不愿诸生作好官”^③，充分体现了漠视名利、以德为重的高尚品格。在叔父品格的感染下，侯方域也形成了忧愤时政、讽喻现实的儒家人格。这在其所作的诸多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如《书周仲驭集后》、《马伶传》等文中均有体现。再者，侯方域曾师从倪元璐和周凤翔。倪元璐为人耿直不阿，曾为东林辨诬，雅负时望。其为文亦多关注兴亡治乱。周凤翔为官清正，胸怀民瘼，心系天下。其激论天下事，“言论慷慨，帝为悚听”^④。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边腹交阨，兵食两绌。凤翔谓：‘宜发内帑以收人心，不宜搜括民财以空国计。’”^⑤甲申之变，北京陷落后，周凤翔赴哭恸绝，自尽殉国。师长辈的清操劲节，无疑对侯方域胸怀家国、拯世救民的文化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① 彭宾：《四忆堂诗集序》，《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

② 《商丘县志》卷八《侯恪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③ 《商丘县志》卷八《侯恪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④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周凤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859页。

⑤ 《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周凤翔传》，《四库全书》，第523册，第390页。

二、侯方域之交游及文学活动

侯方域博学多才,豪迈任侠,一生交游广泛。少年时即与里中隽异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恩、徐作霖、贾开宗等结交,十七岁随父官居北京时,又与陈子龙、夏允彝、彭宾、吴伟业等定交。二十二岁应试南京时,与吴应箕、陈贞慧、方以智、冒襄、张自烈等人结识,并与复社诸子大举国门广业之社。归里之后,又偕昆弟辈及里中诸子结社雪苑,与四方声气相应和。广泛的交游对他思想和文风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

1. 侯方域与雪苑社

明清之际,文人结社蔚然成风。明崇祯十三年(1640)春,侯方域在商丘正式组织雪苑社,一时声震东南,以致“胜流云集,问讯往来,交错于道,南方之才士中原莫不闻,中原之才士南方莫不识也”^①。关于雪苑社之成立,雪苑后劲宋荦《侯朝宗》诗云:“江南复社兴,陈夏维领袖。应社起雪苑,遥托芝兰臭。”^②并自注曰:“雪苑社亦号应社。”其《漫堂年谱》卷一亦云:“里中旧有雪苑社,以应江南复社,故名。”^③可知,雪苑社之成立与复社、应社之关系颇大。目前学界已有观点认为雪苑社之成立确是受到复社和应社之影响。如扈耕田先生《雪苑社与复社关系考辨》就认为:“雪苑社先后参加了复社之南京大会与江北应社,其成员之众,历时之长在复社北方各分社皆首屈一指,是复社在北方最主要最活跃的分支。”^④因此,雪苑社抨击时政,激扬文字,在文学风貌、政治倾向和思想渊源上都与江南文人志士保持一致。而雪苑社领袖侯方域,其创作主张无疑为雪苑社的成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雪苑诸子的文学思想及社团活动实践又促进了侯方域文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雪苑社以侯方域为领袖,前期主要成员有贾开宗、吴伯裔、吴伯胤、徐作霖、刘伯恩等人。他们有着一致的文学主张,即文宗韩、欧,诗宗杜甫。在创作风格上,他们也颇为相近:皆古雅澹泊,能以气谊自尚。由于朝廷腐败、奸佞当道,雪苑诸子济世的政治理想不得实现,只能将其打入文学创作之中。因而这一时期雪苑诸子的创作愤世哀时,真气纵横,基调激昂,极类魏晋风度。而雪苑诸子为人均豪傲疏狂、睥睨世俗。宋荦《雪园五哀诗·徐来玉》曾云:“雪园诸君子,高旷慕晋人。侯、贾千载士,恒遭乡里嗔。”^⑤从侯方域《贾生传》中所描绘的落魄潦倒而又狂放不羁的贾开宗这一形象,我们也可窥见一斑。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破商丘,侯氏一门二十余人死于战乱,社友刘伯恩、徐作霖、张渭和吴氏兄弟皆抗争不屈而罹难,

① 宋荦:《漫堂年谱》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② 宋荦:《雪园五哀诗·侯朝宗》,《绵津山人诗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5册,第536页。

③ 宋荦:《漫堂年谱》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④ 扈耕田:《雪苑社与复社关系考辨》,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48—151页。

⑤ 宋荦:《绵津山人诗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5册,第538页。

侯方域亦流落江南，雪苑社被迫解散。

清顺治二年(1645)，政局初定，侯方域返里，次年贾开宗亦归。二人与徐作肃及其侄徐世琛“相见歔歔，言及雪园旧事，流连者久之”。^① 顺治四年(1647)，宿儒徐邻唐加入，又二年，宋荦随父归里，诸子“相与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②。又二年，“雪苑六子社”再度成立，“古文则准之唐宋八家，今文则准之考亭之章句”^③，往复辩论，声望再起。雪苑社后期的主要成员除侯方域、贾开宗外，徐作肃及侄徐世琛、徐邻唐、宋荦均为后起之秀。其时参与社事活动的还有侯方岳、侯方岩、宋焘、陈宗石等人。随着明朝的倾覆及南明弘光、隆武、绍武诸小朝廷及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灭亡，雪苑诸子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其创作也以苍凉哀怨代替了壮烈慷慨，以情思的表现取代了壮心的抒发，笼罩上了一层浓郁、苍凉、迷茫的色彩。他们追求艺术的精微，文风渐趋琐屑淡远，与现实社会日渐疏离。

雪苑社友的文风取向与思想变化对侯方域的影响颇大。侯方域前期的文章真气淋漓，才情四溢，虽然大部分文章辞藻华丽且内容单薄，却也具有风流潇洒、不可一世之气。如其《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均可体现其高度自信、镇定自若、狂放不羁又不失儒雅的性格。而在与雪苑诸子日夕酬唱、交流思想之后，侯方域后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甚至“大毁其向文”(徐作肃《偶更堂文集》卷上《壮悔堂文集序》)，为文逐渐转向学习归有光及唐宋派，其风格也日益深沉含蓄。特别是在经历了雪苑社的荣衰和政局的动荡之后，侯方域日益认识到政治的无情和现实的残酷，其文学作品处处蕴涵不平之志，饱含家国兴亡之感，散发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如其后期所作的《赠江伶序》、《郑氏东园记》、《管夫人画竹记》等文就充满了世事无常和兴亡变迁之感。同时，侯方域还主张文章应尚用，能寄托忠君报国之思想，明确兴亡治乱之道理，不再只崇尚单薄的才情。如他赞扬杜甫“以忠义自持，一饭一吟不忘君父”^④，又称“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治乱兴亡，离合存没莫不毕具，岂仅仅一咏一吟足以尽风雅也。”^⑤

2. 侯方域与东南名士

侯方域除与里中诸子结社雪苑之外，还结识了许多东南文友，尤其是与当时影响深远的复社、几社等重要人物交往密切，并积极参与了复社、几社的社事活动。明崇祯七年(1634)，侯方域随父官居北京，与前来应试的陈子龙、夏允彝、彭宾、吴伟业等人定交。彭宾、夏允彝、陈子龙均为云间派诗人，亦为几社重要成员，文章、气节均名重一时。陈子龙曾有诗赠侯方域云：“春风宛转下平台，有客横江尺素来。雪苑旧闻司马赋，云间今愧士龙才。东州评鹭琅玕重，中土愁惊鼓角哀。历难公卿

① 侯方域：《雪园六子社序》，《壮悔堂文集·遗稿》，《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第597页。

② 侯方域：《雪园六子社序》，《壮悔堂文集·遗稿》，《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第597页。

③ 徐作肃：《偶更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④ 侯方域：《戴黄门诗序》，《壮悔堂文集》卷二，《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第443页。

⑤ 侯方域：《陈其年诗序》，《壮悔堂文集》卷二，《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第445页。

年少事，汉家宣室为君开。”^①可见其对方域的推重。吴伟业也称赞侯方域“仪观伟然，雄怀顾盼”^②。崇祯十年（1637），侯方域到北京探望系狱的父亲，再与夏允彝、陈子龙等相聚并论诗邸次之中。是年秋，几社名士周立勋来游商丘，与侯方域定交，馆于侯氏，并与梁园诸子争雄长。明崇祯十二年（1639），侯方域应试南京，与复社重要人物吴应箕、陈贞慧及方以智、冒襄、张自烈、姜垓、徐孚远等人定交，与诸人日夕诗酒酬唱并大举国门广业之社。吴应箕赠侯方域诗云：“我来秦淮五月终，于时佳士已云集。就中朝宗最年少，四海心知但一揖。文章诗赋无不工，下笔雷合风雨翕……”^③对侯方域也颇为推重。明崇祯十三年（1640），侯方域因落第家居，主持雪苑社事，但仍与东南名士保持书信往来。明崇祯十五（1642）年，商丘陷落，雪苑社友吴伯裔、吴伯胤、徐作霖、张渭、刘伯恩等被杀，侯门死难二十余人，侯方域流落江南，再与陈贞慧、陈维崧、彭宾等名士往来酬唱，感叹时事。

侯方域与东南名士的交往不仅仅表现在论诗赠文，在政治风云的斡旋之中，他也被卷了进来，并与东南名士同生死、共患难。崇祯十六年（1643），侯方域代父作《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劝阻左良玉东下，被阮大铖诬为左兵内应。为躲避阮大铖的搜捕，侯方域避难宜兴。次年九月，侯方域再到南京，正遇吴应箕避难欲出南京。时金坛好友周鏊及陈贞慧被逮，侯方域遂与吴应箕约会于燕子矶，商量谋救之策。后侯方域出钱财打点锦衣卫，并求援于练国事，贞慧方得免。是年，侯方域亦往依扬州史可法，得以免祸。顺治二年（1645），侯方域至宜兴探望妻儿，在陈贞慧家被逮，后因兵乱才得以逃生。同在这一年，周鏊死于狱中，吴应箕以参加义军被捕死，夏允彝、刘宗周、顾杲等均以兵败自杀。昔日好友渐次遇难，侯方域亦带着灰黯的心情归里。顺治三年（1646），侯方域寄诗陈贞慧，与之相约终隐。其诗云：“悲风从天来，桑榆催短颔。烈士重暮年，收之正复好。种我彭泽田，八口有余稻。富贵如时序，成功不自保。愿言寄遐心，平楚为三岛。”^④

顺治九年（1652）是侯方域交游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也是影响他思想转变的极其关键的一年。该年九月，侯方域携带其《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渡江南游，寄寓陈贞慧家，前后辗转于江阴、无锡、苏州、嘉兴等地，前后拜访了任源祥、姜垓、顾宸、蒋鸣玉、彭宾、彭舜龄、练贞吉、曹溶、沈季友等友人。他还贻书吴伟业谈论出处之道，劝其勿事新朝，并与张自烈相约立言以成不朽。此番南游，天翻地覆，物是人非，一股复杂的难以言喻的历史兴亡感和人生苍凉感冲击着侯方域的心扉，令他激动不安，叹息不已。昔日好友，或坚决抗清、以身殉国；或拒绝征召、削发为僧；或藏身草野、隐居终老，这种坚持气节、不改初衷的精神让侯方域万分感佩；家国的兴

① 陈子龙：《归德侯朝宗书来盛称我土人士之美兼慨世事，诗以酬之》，《湘真阁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册，第250—251页。

② 吴伟业：《冒辟疆五十寿序》，《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96册，第212页。

③ 吴应箕：《我来行赠侯朝宗》，《楼山堂集》卷二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册，第620页。

④ 侯方域：《寄陈子山中》，《四忆堂诗集》卷三，《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51册，第644页。

亡沧桑、人生的喜怒无常又让侯方域在淋漓迸发的激情之余,陷入了沉痛的反思。然而国家衰颓如潮退之迅疾且无以挽回,自负雄才大略的侯方域最终也只能作痛楚的叹息。

三、顺治八年乡试与侯方域晚年复杂心态

清顺治八年(1651)秋,侯方域参加河南乡试,为忌者所沮斥,列于副榜。这一事件成为人们评价其气节人格的一个焦点,历来被争论不休。其中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侯方域此次应试乃逼不得已而为之,如黄宗羲认为“先生之应试,固迫于势,先生自是亦颓丧不堪。”^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也认为“辛卯入试,已拟置解首,为忌者所沮。然朝宗特以全门户,俯首从有司,得失非所计也。”^②李敏修《中州先哲传》卷二十三《文苑·侯方域传》记载侯方域顺治八年中副榜,实因未完卷也。这就暗含着侯方域不愿仕清,又被逼应试,因而故意不完成试卷的意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次应试是侯方域自愿,是其投降变节的一种表现。解放初期,受当时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持此种观点的人甚多。如《从侯朝宗变节说起》^③、《从“煞风景”的侯朝宗说起》^④、《也谈侯方域的失节》^⑤等文章即认为侯方域此番应试有关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含糊不得。

近年来多有学者撰文论及此事,观点各说不一,但与之前的论说相比,更多了一些人性化的考虑。其中有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一是王树林先生的《侯方域民族气节重议》^⑥。该论文认为以封建时代对异代文人的评价标准来看,侯方域在明季只是一介白衣秀才,身不受国恩,名不录仕籍,入清参加乡试,不存在气节问题。且侯方域虽然认为白衣秀才参加新朝的乡试,甚至出仕为官,不存在失节问题,但他并不愿意参加清朝的考试,更不愿做新朝的官。顺治八年乡试是侯氏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保全父亲,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所作的违心选择。这次乡试,表面看是向新朝屈服,实际是一次消极迂回的抗争,他以不把试卷做完的方式,拒绝了与清朝的合作。另一篇论文则是扈耕田先生的《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⑦。这篇论文从分析侯方域晚年的心态入手,认为当侯方域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该论文认为侯方域参加顺治八年乡试,并非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与宋权顺治六年归里、方域顺治七年接受荐举、顺治七年开始新

① 黄宗羲:《侯朝宗先生》,《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26册,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598—599页。

②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第249页。

③ 饮水:《从侯朝宗变节说起》,见《新民报晚刊》,1956年9月29日。

④ 张毕来:《从“煞风景”的侯朝宗说起》,见《光明日报》,1962年6月28日。

⑤ 秋耘:《也谈侯方域的失节》,见《广西日报》,1962年11月13日。

⑥ 王树林:《侯方域民族气节重议》,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03—107页。

⑦ 扈耕田:《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83—86页。

一轮的制艺创作并力求“准之于考亭章句”、顺治八年组织雪苑社以“辅助菁莪之化”、乡试前后和清廷官员频繁交往等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密不可分。而这些都表现出侯方域积极谋求入仕的态度。扈耕田认为,侯方域参加乡试是自愿,并非被迫。

其实,不管侯方域参加顺治八年乡试是自愿还是被迫,这都充分反映了其后期复杂、矛盾的心态。侯方域前期的思想是积极的、入世的,他的狂放不羁、豪迈自信在其前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此点前文已有论述。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其后期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其风格已与前期迥然不同。虽然他前期的豪迈之气还偶有闪现,但文中反映出的更多的是痛苦、矛盾和无所适从。他赞扬友人出世,如在《与方密之书》中称方以智出家乃得其所,《与槁木大师书》也颇为羡慕槁木大师舍弃名利富贵的勇气,而他自己又舍不得离开尘世;他钦佩陈子龙、吴应箕、夏允彝等好友的抗清义举与慷慨气节,并作文沉痛哀悼,自己却不能愤然反抗,而是苟活于世;他虽怀念故国,满腔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却又不泯仕进之心,希冀在清朝能有所作为;他虽大力挾伐投降变节之士,如在《咏史诗》中,对孔光、刘歆屈事新莽大加讽刺,在《管夫人画竹记》中对仕元的赵孟頫语多嘲讽,自己却最终应试清廷;他念念不忘宋末遗民郑思肖,自己却向清吏三省都抚献上《剿抚十议》……总之,侯方域后期陷于理智与情感、思想与行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以至后来沉溺于深重的追悔之中郁郁而终。

侯方域后期的思想是复杂的,难以言表的,而其悔恨亦含有多重意蕴。至于侯方域到底悔什么,我们可以联系其《壮悔堂记》及其前后的思想变迁猜度一二。《壮悔堂记》云:“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倪若是。然则坎壈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从文意中可以看出,侯方域认为自己“傲倪若是”,实乃不合君子之德。此处的傲倪,除了指高傲疏狂之外,很可能还包含自己过于自负、嫉恶如仇的性格,甚至还可能包括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因为这类性格、抱负在乱世中带给他的不是成功与快慰,而是“坎壈而几杀其身”的痛苦。一直以气节为重的侯方域,最终屈身应举、苟活于清朝,也正是他不愿轻易舍弃仕进之理想的结果。而这些带给他的是世人的非议、人生的空幻感及自己更深重的矛盾和痛苦。这种“悔”,已经超越了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如应试与否之类,而是他反思一生言行的结果,是他晚年的人生状态,更是对整个人生历程的总结性的哲学思考。从这种意义上看,侯方域后来作《与吴骏公书》劝阻吴伟业出仕清廷,作《与宋牧仲书》劝阻宋荦出而结交天下贵人,以至与张自烈相约终隐,均是基于历经坎坷之后对人生的认识。此外,从侯方域晚年所作的一篇《字晓儿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此刻的人生态度。侯方域为其子侯晓取字“彦室”,并在文中解释说:“室于应事,故省为;省为,故安于拙。室于处人,故寡合;寡合,故全其朴。”侯方域要儿子“省为”、“安拙”、“寡合”、“全朴”,这些告诫与他早年的豪放

不羈、遍交天下贤士等性格、经历恰好相反，正是他总结自身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哲学思考。

第三节 魏禧生平交游及思想探微

魏禧，江西宁都人，为“宁都三魏”之一，也是当时名振一时的“易堂九子”的核心人物。魏禧自小体弱多病，但其精神却相当健旺。他虽为一介布衣，却一生都在为国计民生奔走呼告。明亡后，他虽隐居于翠微峰，却仍心系民生社稷，为文著述均提倡经世致用。他忠于明朝，反抗清廷，晚年却为民请命而屈交清吏。魏禧的一生都在生与死、仕与隐、明与清、个人清誉与民族存亡的矛盾中艰难抉择，他的生存困境与复杂心态正是清初遗民群体生存状态和思想心态的缩影。

一、魏禧的家学师承及性格之形成

魏禧出生于一个民族意识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魏兆凤，为人忠孝，乐善好施，气节高尚。明崇祯年间，魏兆凤被推举为孝友廉洁，后又 被征聘为师儒，兆凤“以时方重资格，朝廷多党人，虽出，志不得行，俱不就。”^①甲申之变后，兆凤率诸子号哭，竟日不食，后隐于翠微峰，剪发为头陀以终。父辈的影响和诸多儒家经典著作的熏陶，使魏禧拥有了异常牢固的“卑四夷尊华夏”的思想。明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殉国，魏禧悲痛难忍，日往公庭哭祭，曾谋与曾庭遴起义兵勤王，后因李自成军队溃散而不果。清康熙十七年（1678），魏禧被荐举博学鸿儒科，他固以疾辞，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立场。

魏禧十岁开始学习制举文，十一岁即补邑弟子员，十四岁时从学于同里杨文彩，深得杨文彩的赏识。明崇祯十四年（1641），魏禧应诸生试，受到考官郭都贤的赞赏，并被拔置为第一。郭都贤为官清廉，黜贪墨，奖循良，冰霜凛凛，人不敢干以私。魏禧对他心怀天下民生、关注家国命运的精神极为推重，称赞他“抱道履德二十年，闲所著述之文，与所交友造就之士，必有伟论奇人足以震天下之聋聩，开后世之太平者。”^②在父辈及师长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魏禧亦时刻以人民生计为念，为其深受压迫之苦极表同情。二十二岁时，魏禧曾作《限田策》、《救荒策》等文，希冀能解救人民疾苦。此外，魏禧还极力为解除民瘼而奔走呼告，从其《赠黄书思北游序》、《赠宋员外樵关赣州序》、《答翟韩城书》等文中可显见其欲解脱人民于困厄的不懈努力。

1644 年的甲申之变使魏禧的仕进理想化为泡影，也使他认识到科举制业乃

① 杨文彩：《魏征君传》，《宁都三魏全集》集首，《四库禁毁丛书》第 4 册，第 6 页。

② 魏禧：《上郭天门老师书》，《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67 页。

“浮词失意，诡言贼理”^①。二十四岁时，魏禧弃去科举，始从姐夫邱维屏研习古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治学之路。邱维屏“性高简率穆，读书多妙悟”^②，其古文极为时人推崇。在邱维屏的悉心指导下，魏禧的古文创作水平得到迅猛提高，思想也日趋成熟、完善。另外，在邱维屏的苦心劝导下，魏禧学到许多为人交友之道，性格也由年轻时的自大轻狂变得谦和恭逊。他对邱维屏的教诲极为感佩，曾自言道：“窃叹易堂训正以来，直言无讳，以苦口生我，未有如先生之隐发曲中、无有遁情者。”^③后来魏禧出外游历，声名鹊起，广交天下贤豪，在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这种善于自省、温和恭良的性格。

二、魏禧的交游活动及思想历程

在易代之际，魏禧面临着种种生存困境和考验。他由隐逸易堂到走出深山，由阴结豪杰、意图恢复前朝到隐忍屈和、经营后世的生存轨迹充分展现了一名典型明遗民的坚韧与通达。他一生的交游及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清康熙元年之前：隐逸易堂，结交里中志士

明亡前，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魏禧“窃比近贤，谓当出入夏彝仲、陈卧子、黄蘊生之间”。^④他关心国事，喜谈兵戎，并积极参加科考，希望能实现自己保国安民的理想。明朝的灭亡使魏禧惨遭家国之痛，他入清后的种种表现体现出一名典型遗民的孤傲与狂狷。

大力褒扬抗清志士。明亡后，魏禧在创作中热情褒扬抗清志士。他屡屡对江天一、金声、蔡懋德等殉国志士表示深沉的哀悼和怀念。明将杨廷麟在江西沦陷时投水殉国，被营卒临时葬于城外，魏禧多次亲往其丧身之地，探寻故冢，祭慰英灵。甚至对那些勇于死节的妇女，魏禧也表现出无比的敬意。他曾为不愿受清兵凌辱而自刎的烈妇作诔：“妇既烈止，义从如水。人智也生，妇智也死。”^⑤

废弃儒服，放弃科举。儒服不仅是儒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是儒家伦理文化和明代政治的象征。因此，明亡之后，放弃儒衣儒冠，即表示“不承认这个新政权，不再与闻新朝政治，在新的朝代里自我边缘化”。^⑥魏禧废弃儒服、放弃科举，不仅是表明排斥清政权的立场，更是对亡国之痛的反省与追悔。他对明朝的文化、思想、政治进行了激烈的痛苦的批评。他指出科举之业“至今日而滥极，浮词失意，诡

① 魏禧：《内篇一集自叙》，《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7页。

②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8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423页。

③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8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423页。

④ 魏禧：《与温伯芳》，《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02页。

⑤ 魏禧：《叶烈妇诔》，《魏叔子诗集》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07页。

⑥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言贼理”^①，并将甲申之变归罪于科举。他还公开批驳八股文之弊端，主张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论策。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起到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出一种来自明亡的激奋与悲怆。

隐居易堂，提倡实学。清顺治三年(1646)，魏禧与魏祥、魏礼、邱维屏等九人隐于宁都翠微峰，著文论学，体现出卓然自贞的遗民风范。魏禧虽隐身山林，却没有遗忘家国。他说“士君子生际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遗世独立”(《答陈元孝》)，“虽伏处岩穴，犹将任天下之责。”(《郑礼部集叙》)他极力提倡经世实学并身体力行。如他提出了改良科举、限田、革除阉宦三项变法主张，并编撰《救荒策》一文，希望解除民瘼。另外，魏禧还撰写了《左传经世》、《兵法》、《兵迹》、《兵谋》等书，希望能探寻其成败得失之由。针对理学的虚伪及明末浮夸文风的流弊，魏禧提出文章应有用于世，甚至希望用文章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国家之衰败”，使“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上郭天门老师书》)

终顺治一朝，魏禧均坚守遗民气节，遁迹宁都翠微峰，并通过弃儒服、弃科举、不入城等不合作的姿态来表达对清廷的仇视与激愤。这期间魏禧交游的范围拘囿于江西省境内，其结交的友人并不多，除易堂诸子外，只有程山学派、髻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且与他们的交往也仅限于学术思想的交流。从魏禧这一时期的行为特征来看，基本上是个仇清的隐逸者。

2. 清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二年：游历江浙，图谋恢复

在隐居近二十年之后，魏禧意识到长年僻居深山会封己自小。因此从清康熙元年(1662)开始，魏禧数游江浙，广交江南遗民高士及奇伟非常之人，声名鹊起，以致“海内所推一二耆旧大耋之老，争识面引为忘年交，士无识不识皆知有宁都魏叔子”^②。

明亡之后，遗民往往以“不入城市”作为拒绝新朝的姿态，魏禧却一再有东南之行，且公然辩护自己在城市中的流连^③。这种反常举动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阴结豪杰、反清复明的不可言明的意图。我们只要认真品味魏禧的文字，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心志。他说：“士生今日，所可为当为者，正非一端。虽文驾班、马，诗驱李、杜，尚是第二层三层事。”既然经世文章并不是魏禧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所推崇的第一层事究竟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魏禧曾撰写《大铁椎传》一文，描绘了一位勇斗响马贼的奇人。学者胡守仁认为，魏禧此文“殆寓有深意者，其欲为故国报仇之心隐约见之矣。”^④此外，我们从魏禧给陈恭尹的一封书简中也可以窥探

① 魏禧：《内篇一集自叙》，《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7页。

② 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耻躬堂文钞》卷七，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③ 参看拙文《清初明遗民魏禧的生存抉择及心态探微》，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153页。

④ 胡守仁：《魏叔子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页。

其反清心志。参与过抗清斗争的陈恭尹在南明亡后意志消沉,中止了一切反清活动,潜心读书。魏禧特作《答陈元孝书》与他谈论立身出处之道,并希望他能走出户庭,重新振作起来,其用心显而易见。清康熙年间魏禧阴结豪杰、反清复明的表现大致如下:

探访忠烈名士。明遗民大凡都有谒陵或哭陵的经历。如顾炎武一生五谒孝陵、六谒思陵,屈大均在明亡后曾莫祀袁崇焕的陵墓。同样,魏禧初游江南,就到扬州梅花岭拜谒史可法墓,到金陵雨花台怀古伤悼,以示不忘前朝。他还广交江南名士,极力褒扬他们不忘明朝、耻事清廷的忠贞气节。他称赞江南隐士汪汾和徐枋说:“武林汪魏美飞鸿千仞,吴门徐昭法寒冰百尺,人不可得近,况得而狎玩之乎?”(《与徐昭法书》)对恽日初的忠贞志行,他也极为赞赏:“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国家之败,此非可以文章求也。”(《恽逊庵先生文集序》)此外,魏禧还提醒大家要始终保持遗民的忠节。他曾劝诫与仕清官吏交往亲密的方以智“昭濯既往,显示将来,以不虚二十年出妻屏子之素节。”(《与木大师书》)

阴结豪侠志士。魏禧曾一再表示欲于“行伍屠沽”中物色“非常之人”。他说:“当天下之变,任天下难事,必有倜傥非常之人好义而轻其身者,毅然自奋于毁誉利害之外,然后其事可济。”(《赠王孝成叙》)他认为真正能独行于乱世的豪杰志士“往往崛起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之间”(《答杨友石书》)。因此,他屡次游走于当时反清最为激烈的江浙之地,在乡壤山林中物色豪杰志士。借出游以联络声气、图谋恢复可以说是易堂之人的重大任务之一。如魏际瑞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魏伯子文集》卷三《续师说》),彭士望也孜孜于寻访“一旦处事变之穷”,能“倜傥画策、定非常,解纷难,互相持于不败者”(《耻躬堂文钞》卷五《送王若先南游叙》)。当然,奔走四方、连结豪杰是明清之际很多遗民的共同姿态,不独易堂诸子为然。如颜元、李因笃、顾炎武、归庄、孙奇逢等遗民均曾远游他方,结交豪杰志士。

探访卓犖少年。寻求卓犖少年是魏禧游历江南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他认为“任天下难事,当天下之变,非少年血气雄刚不足胜任。”(《答南丰李作谋书》)在游历江浙十多年的时间里,魏禧结交了李元慈、甘京、李作谋、吴正名等青年才俊。其中,魏禧与熊颐的交往颇值得注意。熊颐早年曾有终隐深山之志,魏禧与之结识后,向他表述了自己出山漫游的初衷,并希望他能追随其后。在魏禧忧心家国思想的影响下,熊颐走出山林,亲到翠微峰师从魏禧研习经世致用之学,并贬服毁容游四方。

综上所述,魏禧有反清复明的强烈的愿望并曾为这种理想奋勇奔走。当然,在其团结遗民、探访志士的实践背后充满了艰难与凄怆。在游历江南之初,魏禧的心胸气魄是很大的。但在社会现实的切身体验中,魏禧日益认识到恢复之事的不易。首先,魏禧结识的很多遗民虽能坚守气节,但因年老体弱、苦于自保,已无力关心世事;或因饱受清廷的摧残与打击,日益消沉。特别是至亲好友的日益衰老甚至逝